

第三章 鍾理和的生活經歷與魯迅

第一節 文學啟蒙與魯迅

鍾理和的一生與文學始終脫離不了關係，而他的文學啟蒙是來自於多方面的影響的。在鍾理和致廖清秀的信函裏以及應林海音女士來函而作的自我介紹中，都有詳細的敘述，其哲嗣鍾鐵民也有補述，根據上述資料大致可歸為以下五點：

一、藝術天賦的激發

鍾肇政曾經盛讚鍾理和，認為在眾文友中，「兄是唯一的，最有作家氣質的人」¹，鍾鐵民也曾述及「天生的浪漫氣質和對文藝的愛好」²是導致鍾理和踏上文學之路的原因，這些論點都說明了鍾理和的文學成就，不僅僅來自於他的刻苦與堅持，與身俱來的藝術天賦更是一項重要因素。

鍾鐵民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曾經表示他們的家族成員，似乎都具有藝術天賦。例如鍾理和的伯父閒來就喜歡吹吹笛子，頗有傳統文人的雅趣，鍾理和自己從小就想學畫畫，而鍾理和最小的弟弟鍾里志想學聲樂。甚至在鍾理和死後，還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畫筆、油畫原料以及極為珍貴的石版印的國畫畫本。³因此日後鍾理和選擇文學為終身志業，無論環境如何困苦，寫作的條件如何惡劣，始終都未嘗放棄文學。面對生活的嚴謹態度，執拗的個性，一如他對文學的堅持，這些都與他天生的藝術氣質難脫干係。

二、求學生涯的挫敗

在〈我學習寫作的經過〉一文中，鍾理和曾如此的自我介紹：

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弟，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是給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我的心，我私下抱起決定，由別種途徑趕

¹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出版社，1988），頁 105。

² 鍾鐵民，〈鍾理和的文學生活〉《國文天地》16 卷 11 期（2001.4），頁 7。

³ 據鍾理和哲嗣鍾鐵民的口述，參本論文附錄。

上他們趕過他們的野心。這是最初的動機，但尚未定型。（《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自我介紹》6，頁 217-218）

這三個好友分別是異母弟鍾和鳴、姑表兄邱連球與堂兄邱九河⁴，他們都同時考上了高雄中學，而鍾理和卻因體檢不通過而落第了。如此的打擊是相當沈痛的，使得鍾理和自「少時覺得每個人都比自己中用」，常常有「我不如人的」感覺，以致於希望由「別種途徑」迎頭趕上。而這「別種途徑」究竟為何？鍾鐵民曾說：

父親的性情雖然和順，但是他很好強，也很自尊，不肯輕易服輸。當年他身體多病，功課趕不上自己的兄弟，畢業後他獨自被摒於中學門外，傷心失意之餘，他企圖從另一條路去追上他們。於是他選了寫作。⁵

然而一開始，他並不是把寫作、當作家作為目標。自幼便充滿藝術天賦的鍾理和，最早提出的要求是至日本學畫，但其父鎮榮公認為繪畫是末流，沒有許可；而當時掌理家中財務的大哥鍾里虎也不表贊成，在同時遭到具客家務實性格的父兄否決下，因而作罷⁶。而後因其愛好藝術的傾向，開始接觸文學。觀諸鍾理和一生的文學創作生涯，雖然窮困潦倒，限於客觀的時空環境，終其一生未能以文名於世，然經歷過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洗禮後，鍾理和文學的價值重新受到肯定。雖然對於鍾理和的「生不逢時」，總令人感到些許遺憾，但當初希望透過「別種途徑」趕上好友的願望，可以說是真正的實現了。

三、新舊文學的薰染

鍾理和投考高雄中學落榜後，便進入了長治公學校高等科就讀。這二年中，「藉著由父親手裡得到的一點點閱讀力」，鍾理和「熱心瀏覽中文古體小說」（《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自我介紹》6，頁 218），線裝的通俗小說《楊文廣平蠻十八洞》，

⁴ 這三位鍾理和的好友，都先他而逝。鍾九河於臺北高校畢業後，便因腎臟病而逝世了。鍾和鳴與邱連球在「白色恐怖」的五〇年代，因「匪基隆市委會案」，分別於 1950 年與 1954 年，先後仆倒於馬場町刑場。詳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4）頁 53、200、203。

⁵ 鍾鐵民，〈父親·我們〉，《台灣文藝》1 卷 5 期（1964.10），頁 20。

⁶ 鍾鐵民，〈鍾理和的文學生活〉，《國文天地》16 卷 11 期（2001.4），頁 7。筆者後來專訪於鍾鐵民先生時，亦提及此事。參本論文附錄。

便是他的第一部教科書。(頁 114)「小高畢業後，入了一年半村塾攻讀古文——中文」，「入村塾後，閱讀能力增高，隨著閱讀範圍也增廣，舉凡當時能夠蒐羅到手的古體小說，莫不廣加涉獵。後來更由高雄嘉義等地購讀新體小說，當時大陸上正是五四之後，新文學風起雲湧，北新版的魯迅、巴金、郁達夫、張資平等人的選集，在台灣也可以買到。」(頁 218) 這些三 0 年代重要作家的作品幾乎讓鍾理和廢寢忘食，甚至「在熱愛之餘，偶爾也拿起筆來隨便亂畫。不過那時並不曾打算當作家，只是藉此滿足模仿的本能而已。」(頁 218) 而就在遍讀新舊體小說並生發「模仿」的動機下，鍾理和開始了他的創作。他的第一篇小說為〈由一個叫化子得到的啓示〉，接著又寫了〈雨夜花〉，「描寫一個富家女淪落為妓的悲慘故事，這是根據一個酒家女的敘述而寫的」，總共「寫到第七回三萬餘字」。(頁 218) 廣泛地閱讀新舊文學，造就了鍾理和中文創作的基礎，尤其是中國新文學，對於往後他的文學創作風格、內容與形式，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四、異母兄弟的鼓勵

鍾和鳴為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和鳴為大老婆所生，理和為小老婆所生，兩人出生時間只差廿多天。從小，兩人的感情特別好，既是兄弟又是朋友，甚至當祖父把寵愛理和的心，完全轉移至和鳴身上，甚至還超越時，理和對這位弟弟的感情仍是始終如一，毫無一絲的嫉妒，而這也是和鳴始終稱讚與敬佩理和的地方。因此，雖然升學的挫敗帶給理和心中莫大的刺激，但並不影響兩人的情誼，所以理和也樂意並希望這位兄弟可以分享他的創作：

有一次，我把改作後的第一篇短文拿給我那位兄弟看。他默默看過後忽然對我說，也許我可以寫小說。我不明白他這句話究出於無心抑有所感而言。他對我來說，卻是一句極為可怕的話。以後他便由台北，後來到日本時便由日本源源寄來世界文學，及有關文學理論的書籍——都是日文——給我。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但他的這種作法使我不斷和文藝發生關係則是事實。我之從事文藝工作，他的鼓勵有大關係。(《鍾理和全集·鍾

理和自我介紹》6，頁 219)

鍾和鳴「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鍾理和全集·原鄉人》2，頁 9) 此外，他也常常閱讀馬克思思想與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與日本老師起衝突的原因就是在課堂上偷看大陸作家作品，不但被制止還被罵作「清國奴」。

一九三〇年前後的臺灣知識界與文化界，受到了日本與中國的影響，與日本本土、中國大陸或其他世界各地一樣，都瀰漫著濃厚的社會主義氣氛。當時在知識青年之間，閱讀社會主義書籍蔚為了一種流行，不懂社會主義思想，是容易被當作嘲笑對象。然而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卻是極右派，對這些思想，不論在日本本土或臺灣，皆難以容忍，再加上日本處心積慮的想要消滅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使臺灣徹底的日本化，成為其領土的一部份，因而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的日本老師，對於鍾和鳴的舉動，當然是無法忍受的。

如此具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鍾和鳴，在挑選寄給鍾理和世界文學著作與文學理論時，相信應該也傾向於較具「左翼思想」特色的作品吧！同時，如此的思想特質，應該也對鍾理和產生相當的影響，所以鍾理和的創作始終以寫實主義為其表現的手法，而且強調文學的社會性，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了。鍾和鳴持續的鼓勵，讓居住在偏僻農村的鍾理和，能夠如當時台灣知識青年般，透過日文接觸到當時世界文學的潮流與文藝理論，無疑地，這對奠定日後鍾理和的文學基礎，產生了莫大的助益。

五、同姓婚姻的受阻

影響鍾理和一生最鉅者莫過於他那驚世駭俗的同姓婚姻，不僅讓他平淡悠閒的「頭家子」生活掀起了波濤巨浪，也讓他從此踏入文學創作的世界，以寫作終其一生。他曾自述他的婚姻與文學的關係：

讀畢一年半的村塾，翌年——我十九歲——我家自屏東縣遷到現居地來開拓山林。在那裡我認識了一個農場的女工，後來又愛上了她。但不幸，我們都是同姓。我們受到舊社會壓力之巨和為貫徹初衷所付代價之巨，是無法在這裡形容的。這是我生平又一次大刺激；被壓迫的苦悶和悲憤幾乎把我壓毀。這時候我兄弟那句話開始對我發生影響了，我想藉筆來發現蘊藏在心中的感情的暴風。這思想把我更深的驅向文藝。由此時起要做作家的願望開始在心裡萌芽起來。（《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自我介紹》6，頁219）

「同姓不婚」是當時客家社會普遍存在的祖宗家法，在早期或許有「優生學」考量的必要性，然世代承襲而不思檢討的結果，反而成爲封建陋規，尤其在保守封閉的客家社會中，更是不得任何人逾越的鴻溝。鍾理和與鍾平妹的相戀，正是觸犯了客家社會的「大忌」，牽動了其中最敏感的神經，縱使見多識廣，一向開明作風的鍾蕃薯，面對其子的「叛逆」行徑時，也只有屈從於龐大的封建勢力下，大力反對，甚至不惜把他趕出家門去。然而這樣的結果並沒有擊垮鍾理和的愛情，反而讓他更加執拗的「爲愛走天涯」，帶著台妹前進新天地——奉天，同時也把他的人生推向文學世界。「如果鍾理和不在農場邂逅了鍾台妹，進而演出『奔逃』，鍾理和的中文作家之夢，極有可能只是一個青春少年的文藝殘夢。」⁷從此，同姓婚姻遭受的磨難與鄙視，經常成爲鍾理和文學的主題，「平妹」闖進了他的文學世界中，甚至在他的精心形塑下，成爲台灣文學中最美麗的婦女典型。

雖然以上論述的五點，都是促使他走上文學之路的原因，但影響他日後文學風格與精神最深的還是來自於中國新文學的作家與作品，尤其是魯迅。雖然日本政權爲了對台灣遂行同化政策，實施各種禁令設法杜絕中國文化思想在台灣本土的滋生，但是在一九三〇年左右，鍾理和還是能夠透過管道購買並閱讀魯迅、巴金、郁達夫、張資平等中國三〇年代知名作家的作品，不僅奠定了日後的文學基礎，也深深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例如現存鍾理和最早的一篇創作〈理髮匠的戀

⁷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8。

愛》⁸（完成於 1937 年，後來的〈理髮記〉即本於此），其中提及對於由男理髮匠換成女理髮匠時，內心恐慌不安，認為女理髮匠靠不住，因而得出「我怕得有理」的結論。而只要讀過魯迅〈狂人日記〉的人，對「我怕得有理」這句話應該不陌生，這是狂人日記第一則的結尾，一連串懷疑與恐懼的開始。兩相比較，我們很自然可以見到鍾理和在創作初期對魯迅文學模仿的部分痕跡，也可以感受鍾理和對魯迅文學的熟悉。

這些三〇年代的左翼文學家，都具有「反帝」、「反封建」、「反專制」的色彩，尤其是魯迅的「戰鬥」精神更是貫串整個文學與生命。在閱讀的潛移默化與原有的民族意識驅使下，再加上本就執拗的脾氣，因而讓他有了為爭取婚姻自由的「大陸行」，造就了他以「中文作家」立身的職志。

第二節 中國體驗與魯迅

同時代的台灣作家中，鍾理和是少數擁有大陸經驗的作家之一。一九三八年六月赴大陸，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返台，總共在大陸待了八年，其中前兩年住在奉天（瀋陽），一九四一年夏，搬往北平居住。在這期間，奠定了鍾理和作為一名專業作家的理想與基礎。由於鍾理和生性不喜應酬以及專心讀寫的原因，他極少出現在交際場所，關於他在大陸期間的生活與思想全貌，並無法由他人的追憶文字瞭解一二。雖然他有寫日記的習慣，但不知何故，寫過三次的日記都被他焚燬了，僅僅只留下抗戰勝利後至返台前的文字，記錄他大陸經驗的吉光片羽。不過，幸好旅居大陸期間，為了成為中國的作家，他勤奮努力地讀寫，除了在民國三十四年由北平馬德增書局出版了他生平的第一本作品集《夾竹桃》之外，他還在《新臺灣》發表了〈白薯的悲哀〉一文，以及陸續創作的尚未發表的文章。透過日記與創作文字，我們當可一窺鍾理和旅居大陸八年的生活、情感與思想。至於鍾理和在大陸期間專心讀寫所留下的十五篇創作，悉如下表：

篇名	體裁	寫作（完成）年月	發表情形	備考
----	----	----------	------	----

⁸ 現行《鍾理和全集》並不收錄此篇作品，可在鍾理和數位博物館上得睹文件原稿。

友情	未完成	一九三八年	未發表	《全集》未收
都市的黃昏	短篇小說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	未發表	後改寫爲〈柳蔭〉
泰東旅館	未完成	一九四一年	未發表	
游絲	短篇小說	一九四三年八月	一九四五年四月 收錄於《夾竹桃》	
新生	短篇小說	一九四四年三月	一九四五年四月 收錄於《夾竹桃》	
薄茫	中篇小說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九四五年四月 收錄於《夾竹桃》	
夾竹桃	中篇小說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一九四五年四月 收錄於《夾竹桃》	
生與死	短篇小說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 《台灣文化》第一卷一期	
地球之黴	未完成	一九四四年	未發表	
逝	短篇小說	一九四五年七月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 《政經報》第二卷五期	
供米	未完成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未發表	僅有二頁稿紙，原稿亡佚、見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六日北平日記記載
秋	短篇小說	一九四五年	以遺作發表於一	

			九六〇年《晨光》 第八卷十期	
第四日	短篇小說	一九四五年	未發表	
門	中篇小說	一九四五年	未發表	原題為「絕望」
白薯的悲哀	散文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台灣》第二期	

一、原鄉憧憬與文學生活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鍾理和依憑著先前二年在奉天建立的一個小小立足點，帶著台妹，搭乘馬尼拉丸號由高雄出發，經基隆至日本門司；再由下關登上開往韓國斧山的輪船；最後坐上南滿鐵路的火車，直奔目的地奉天。

關於鍾理和這段「奔逃」的經歷，無疑是他人生旅程上的一大轉捩點，對於其文學事業的建立，更是關鍵性的決定。在「奔逃」之前鍾理和的生活，不能不說是富足而舒適的。在農商兩棲的父親銳意經營下，鍾家的事業雖然經歷了投資中國生意的失敗，但是並未動搖根基，仍能持續維持原來富裕安定的生活。在如此環境中成長，雖然不能說是紈袴子弟，但是對於「十一歲時，還要姊姊給我洗澡」的鍾理和而言，終究在人生的旅途上還未嚐到現實生活的苦果，仍如一株「溫室中的花朵」。第一次到奉天的動機，雖然也有為兩年後的「奔逃」立下經濟基礎的打算，但也包含了「希望藉由時空的距離，是不是就能讓這段感情散了的企圖」⁹。而且當時的奉天為滿州國的所在地，真正握有實權的為日本人，對於當時日本本土的人民，抑或其殖民地的朝鮮人與台灣人而言，它是個具有無比吸引力的「新樂土」，再加上台灣人身份的特殊¹⁰，對於一心想要回歸原鄉、親

⁹ 據鍾理和哲嗣鍾鐵民的口述，參本論文附錄。

¹⁰ 臺灣在被納入為日本的殖民地後，總督府為了切斷臺灣與中國之間的文化與人際紐帶，不僅逐年強制關閉臺灣舊有的私塾，在一九〇七年又頒佈〈渡華旅券條例〉，對於想要渡海至中國大陸的台灣人而言，繁瑣的手續與苛刻的條件，令一般人望而卻步。由於在法律上，台人隸屬日本籍民，奉天當時又在日本政治勢力控制下，因此前往奉天是要比前往其他大陸省分來得容易。

炙原鄉的鍾理和而言，奉天無疑是他的第一選擇。因此在奉天的兩年，鍾理和除了進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駕駛技術，而且也深入觀察這塊新天地所蘊藏的商機。他因著家族事業的背景，認為磚窯廠是個可以投資的行業，回台後，也獲得鎮榮公的贊同，然而因當家的里虎兄的反對而作罷。¹¹

經過兩年時空距離的考驗，鍾理和與台妹仍然無法忘卻彼此的情感，因此爲了爭取「同姓之婚」，在「不顧一切，不惜和父親、和家庭、和台灣訣絕」的情況下，兩人決定遠走奉天，去開創屬於自己的新天地。這一次再到奉天的動機，表面上看來無疑是爲了爭取愛情與婚姻的自由，然而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支配「同姓不婚」觀念背後的那龐大而陳腐的封建勢力。在戰後一次與廖清秀通信的內容裡，鍾理和回憶與妻子艱辛曲折的婚姻之路時，他說：

現在事後回想，如果當時她是另外一個女人，那麼在受到如許磨折和阻力的時候，也許我把她放棄了。但偏偏是同姓！偏偏舊社會不允許同姓的人結婚！這事倒反而是在心裡激起一種類似偏執狂的固執和倔強的意志。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三十日鍾理和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6，頁116）

鍾理和出走的動機並非只是爲了爭取一段平凡普通的愛情與婚姻，而是爲了反抗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罪惡的，不被允許的，原則性的道德問題，而此種道德問題又是源自傳統頑冥且又愚昧的封建思想。因此當得悉理和與台妹的相戀時，縱使在當時作風開明，極具變革思想的鍾蕃蕃，仍然無法擺脫封建勢力的制約而大發雷霆，認為理和的行徑爲「羞辱門第」，屢次的將他趕出家庭。但是鍾理和非常明瞭這罪惡的源頭並非在父親本身，而是在左右父親行爲思考模式的封建思想，其實父親本身也是這腐敗思想的受害者。¹²這種對傳統封建思想執拗的反抗心理，不僅讓鍾理和的人生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對於他文學志業的抉擇，也形成了關鍵性的因素。鍾理和在給廖清秀的信函中又說：

¹¹ 據鍾理和哲嗣鍾鐵民的口述。

¹² 鍾理和在〈門〉中透過袁壽田之弟的口中道出：「因爲我們要反抗的對象，並非父親本身，而是根本寄託在父親身上的破碎的舊時代的影子。父親仍是我們可愛的父親，我們寧可同情他爲這些腐敗思想所束縛，所蠶蝕的那種不幸。」，見《鍾理和全集》2，頁291。

封建勢力有壓倒之勢，不容抗拒，在它下面，我是軟弱渺小，孤獨無援。如何才能讓自己在這場搏鬥裡支持下去呢？很顯然的我必須借助更有效的武器，否則敗北是注定了的。於是，我又想到我兄弟那句話。也許我可以用我的筆！這思想把我更深的驅向文藝。由這時候起，要做作家的願望和意志漸漸在心裡堅定起來。（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三十日鍾理和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6，頁115）

鍾理和的藝術天賦與年少時對文學的嚮往，因著「同姓之婚」事件的刺激與伴隨而來的龐大封建勢力的壓迫，開始了他的文學志業。好強、自尊、不肯服輸的個性，不但讓他無畏於排山倒海而來的封建勢力，反而讓他「心裡激起一種類似偏執狂的固執和倔強的意志」，選擇以文學來進行對封建思想的搏鬥，選擇以文學作為趕上他其他兄弟的途徑，更堅定了他作為一名「中國作家」的理想。

鍾理和想要成為「中國作家」的理想，早在他逃奔大陸前便已存有，後因「同姓不婚」的封建壓迫，更堅定他以文學為職志的人生方向。鍾理和在給廖清秀的信上曾經提及當時想要當「中國作家」的困境：

作中國的作家，已經是一個不幸，何況在當時異族統治下，臺灣那種環境要想以中文立身，那是怎樣的輕妄，他（指鍾和鳴）似乎並沒有想到。我們無異在企圖不可能的事情。當然，臺灣的光復是不在計算範圍內的。（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三十日鍾理和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6，頁115）

在鍾理和開始接觸文學，大量閱讀中國新舊體小說與嘗試創作文學作品的一九三〇年代，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同時也進入了一個較為穩固的時期。隨著殖民教育中「國語政策」的實施，在殖民地台灣出生的新生代，從小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常通行的語言為日文，反映到文學創作的語文上，也漸漸從中文轉移到日文，甚至台灣作家的日文作品的水準已能與日本中央文壇並駕齊驅。¹³現存最早的鍾理和作品為完成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理髮匠的戀愛〉，不久之後的四

¹³ 如一九三四年十月，楊遠的〈送報伙〉參加日本《文學評論》徵文比賽獲得第二名（第一名從缺）；一九三五年一月，呂赫若的〈牛車〉也發表於《文學評論》上；一九三七年四月，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日本改造社《文藝》的佳作推薦獎。

月一日，台灣總督府便下令全面禁止使用中文。不論衡諸當時臺灣文壇上的趨勢或當時客觀的政治形勢，身處臺灣的鍾理和，確實是在「企圖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們可以相信，鍾理和的奔逃不僅在抗拒「同姓不婚」帶來的封建壓迫，更有其欲完成「中國作家」理想的動機，當然，根據他自己所說的，「還有一點民族意識在作祟」(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三十日鍾理和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6，頁116)。

爲了抗拒不合理的封建惡勢力，爲著爭取愛情與婚姻的自主，也爲了可以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鍾理和與台妹經歷了千辛萬苦，懷著憧憬與理想，終於來到了新天地——奉天。然而奉天給予他們的卻不是舒適安定的新生活，他們所面對的只是一連串的失望與落寞。原本希冀取得駕駛執照後，可以據此在奉天獲得生活與經濟上的立足點，然而駕駛工作的卑屈性質，純然違背了鍾理和心中所堅持的人格尊嚴。他藉著〈地球之黴〉的主角崔志信的口，認爲司機是與妓女同爲「伺候老爺」的同路人，「雖然當了幾年司機，可是他還不能把自己完全容納在工作，並由這裡獲得滿足、像和別人一樣。」後來「又因為北地冰凍路滑，連續發生事故，執照被吊銷而失業。」¹⁴另外，我們透過記敘在奉天生活情形的〈門〉的內容可以知道，攜眷再次來到奉天的鍾理和，因著他的「秉性冥頑，缺乏妥協」的固執個性，致使謀職不順遂，生活亦不如意，而有「出不能有用於家國，入不能保有其妻子」的慨嘆。現實生活與心靈上的困境與煎熬，鍾理和面對的是有生以來最艱困的生命試煉！

由於現實上種種的困頓與挫敗，鍾理和帶著妻子三人，於一九四一年夏天離開「食血獸」般的「不潔」城市——奉天，遷居北平。抵平後的生活，「最初在華北經濟調查所做事，後經營石炭零售商。但有一半時間靠一位表兄弟接濟，不做事。」(《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自我介紹》6，頁221)北平在七七事變後不久便告淪陷，成爲日本的勢力範圍，而華北經濟調查所便是日人機構。來自台灣的

¹⁴ 鍾鐵民，〈鍾理和的文學生活〉，《國文天地》16卷11期(2001.4)，頁12。

鍾理和，因著語言與身份的便利¹⁵，謀得了這份待遇不錯的工作，然而僅維持了三個月後便辭職，離職的真正原因，鍾理和從來未曾提及，但依其自尊不願屈服的個性，以及在奉天刻意由「生活比較能安心的日本街，搬到滿人街來」（《鍾理和全集·門》2，頁 248）的生活經驗看來，應該與其內心澎湃的「中國愛」有關。辭去了調查員的工作後，賣煤炭成了他生活的經濟來源。由於鍾理和與家族的幾個兄弟的感情都很好，當時與他同在大陸的除了在廣州參加祖國抗日運動的鍾和鳴外，還有在河南當通譯的姑表兄弟邱連奇（鍾理和少年時代三個同年好友之一邱連和之弟），而連奇就是援助鍾理和北京生活的表兄弟，後來也搬至北京，住在東鐵匠胡同，二人時相往來。由於職務之便，邱連奇常有些意外之財，交由鍾理和保管運用，然因誤信友人，導致投資煤礦事業失敗，這也就是鍾理和成爲石炭零售商的原由。¹⁶

無論是在奉天或北京，鍾理和的生活並不順遂，經濟上是持續的匱乏，然而他對文學事業的堅持與專注，卻是無一日懈怠的。鍾理和之妻鍾台妹曾經追述他們在北京的生活情形：「他白天出去賣煤炭，生活挺苦的，他晚上回來還寫作，寫得很晚。那時，偶而家裡會寄一點錢來，但是很少。」¹⁷縱使在如此艱辛的環境中，鍾理和仍然堅持著他的文學事業。戰後他在給廖清秀的信函上也曾經提及：「旅居海外的九年間，我已經確立了自己的路線——文學，因而也就把全副精神和時間都化在修業和準備的工作上。」（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三十日鍾理和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6，頁 116）因此，旅居大陸期間的鍾理和，無論在擔任汽車駕駛、華北經濟調查所調查員、或是石炭零售商的工作時，若非心生厭倦就是擔任時間不長，其最大也最可能的原因應與他以文學爲人生的志業有關。擔

¹⁵ 鍾理和在〈祖國歸來〉一文中，曾經很明白的敘述了身爲殖民地人民的台灣人在大陸生活的尷尬處境：「當一個台灣人離開故國去到人地生疏的異域，要想能和既能吃苦、又肯耐勞的、有著強韌的生活力的國內人士相競爭，那是很難的。除開一部份做生意的商賈人以外，要想能在那兒住足，並且生活下去，那是需要某種特殊的技術與條件的。而歷史便給了他們這些。有什麼貨賣什麼東西，他們過去受的是日本教育，法律上又是日本籍民，然則他們只好，也只能藉此教育與國籍賜與他們的能力與方便吃飯。如此，他們很自然的都在偽政權之下解決了生活問題。」，《鍾理和全集》3，頁 12-13。

¹⁶ 關於鍾理和與邱連奇在大陸彼此交往的情形，根據鍾理和哲嗣鍾鐵民的口述，參本論文附錄。

¹⁷ 王麗華，〈鵝鵝之情——夜訪鍾台妹女士〉，《台灣文藝》1卷 54期（1977.3），頁 51。

任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只是維持基本的經濟來源，以支持他的文學事業，然而當這些工作妨礙了他的寫作時，便毅然的捨棄。根據前表，待在奉天的前後將近三年間，他已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說與一殘篇的初步創作成績。而遷居北京後，真正地「堅定了要做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決心，因而也就在此時，始真正埋頭讀書。」（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與林海音信《鍾理和全集》6，頁 150）也因此在北京的前後五年多的時間，他的文學事業更加穩固了。除了一九四二年沒有具體的創作成績外，每年至少都有一篇作品，尤其是旅平的後半段生涯，一個人默默且孜孜不倦地修業與準備所蘊蓄的創作能量於焉爆發，形成了鍾理和前期創作的一個顛峰。一九四四年他有兩篇短篇、兩篇中篇小說與一殘篇的成果；一九四五年他也有三篇短篇、一篇中篇小說與一殘篇的創作成績；即使是在戰後的一九四六年，最後停留在北京的三個月間，因台灣人尷尬身份所引發的動盪生活與準備歸返台灣的匆忙中，鍾理和仍然完成了一篇散文。此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北平馬德增書店亦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本創作集《夾竹桃》。至此，欲成爲「中國作家」的企圖，以文學爲人生志業的理想，得到了初步的成就。

這段時期所創作的十五篇作品中，收在《夾竹桃》中的四篇小說是最具代表性的，其中的中篇小說〈夾竹桃〉，又是最受到後來評論家的注目，所引起的爭議也最大。小說以第三人稱寫就，實際上是作者藉由主角曾思勉的眼睛，客觀而冷靜地觀察著擁有前後三進座落在北京的大雜院，裡面住著的形形色色人物，以及他們所表現的生活與舉止行爲。表面上寫的只是一座大雜院，實際上是把它視爲整個民族的縮影，文中對於它所呈顯出的貧窮、敗德、醜陋的一面，予以無情的批評，文字辛辣諷刺，頗有魯迅風。關於這點，我們將在第五章第二節裡作深入且詳細的討論，此處不再贅述。〈游絲〉所抨擊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女主角朱錦芝擺盪在親情與愛情之間，對於父親所定下的婚事，經過一番掙扎與長考後，她選擇了愛情，於是又重新找回昔日的明朗笑聲與快活身影。〈新生〉是針對儒家所構築的倫理道德的虛妄，予以無情的譏諷。小說主角因爲堅持正義而失業，失去了生產能力的他，連帶地也失去了原本在家庭中所有

的地位和尊嚴，只有重新覓得新職時，才再度找回自我。對於傳統美好家庭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倫理道德，予以徹底的批判。〈薄芒〉是《夾竹桃》系列中唯一以台灣為背景的作品。女主角「英妹」是個非常孝順的農村姑娘，為了家庭已經犧牲一次婚姻機會的她，好不容易與表弟「阿龍」譜出了一段戀曲，然而又在父親自私的心態下，託詞拒絕了這段婚姻，最後受不了愛情挫敗的「阿龍」發了瘋，「英妹」含淚辛勤地操持家務，照顧父親與弟妹，徒有「孝順姑娘」的美名。小說通篇平實的敘述，卻飽含了文字的力量，尤其「英妹」父親那宣傳式的道歉：「可憐這孩子……」以及父親老友們的稱讚：「英妹真孝順呀，孝順的姑娘呀！」其中所蘊含的反諷力量是驚人的，如同上述〈游絲〉、〈新生〉，都在作品中無情地拆解中國封建社會中所具有的偽善與矯情。

另外值得注意的作品是〈泰東旅館〉與〈門〉。前者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以第三人稱寫成，藉由主角老陳客觀而冷靜的態度，看著「泰東旅館」這座大雜院內的形形色色。〈夾竹桃〉的背景與企圖與此作相仿，都是將民族的影子濃縮在「大雜院」中來看待，藉由批判其中住民的敗德與偽善，來達到批判國民性的真正目的。後者是一篇日記體的小說，不同於〈泰東旅館〉的是它以第一人稱敘述，主角「我」在異地飽受失業之苦與現實生活的困厄，而將未來美好生活的理想寄託在康孝先身上，但等待的結果卻是康孝先死亡的消息。作者以「康孝先這個人物的死，所暗示的是，在『中國』的內地想尋求自己生之場所『我』的企求及挫折。」¹⁸小說以門始，以門終，關上門也就是關上光明與希望，緊閉的門彷彿緊閉的心房，帶來的只是寂寞、灰心與痛苦，相當真實地表現出鍾理和「奉天生活」的幻滅！以上所論述的作品，再加上〈柳陰〉（由〈都市的黃昏〉改寫）中對朝鮮封建式婚姻（早婚與包辦式婚姻）的批判，他們都同樣表現出「抵抗」的意識，對無形而如同巨網的封建制度予以嚴厲的反擊。

二、鍾理和日記中的魯迅

¹⁸ 澤井律之著、姚巧梅譯，〈論在大陸時代的鍾理和〉，「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11），頁9。

鍾理和在大陸生活前後八年，主要居住地為奉天與北京。在奉天的二年多，尤其是攜帶心愛的平妹，第二次踏上奉天土地之後的生活，就如同彭瑞金所說：「〈門〉所描寫的，乍到奉天一年不到的生活經歷，在現實裡，是一段飢餓、屈辱揉合著死亡與悔悟的生命滄桑史，也是鍾理和的精神煉獄。」¹⁹生活的困頓、就職的不順遂以及對奉天的徹底失望，現實生活所帶給他的是生命中的又一次大挫敗。於是，他帶領妻兒來到了北平。

同在北平的臺灣文人還有張我軍、張深切、洪炎秋與林海音。張深切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堂ノ脇光雄和浦野壽一郎的支持下創辦《中國文藝》並擔任編輯。張我軍與洪炎秋當時都在北京大學任教，也常常向《中國文藝》投稿，張我軍甚至在張深切因父病不得不回台時，還暫代編輯一職。而《中國文藝》發行初期，都是透過洪炎秋在北京城內經營的「人人書店」，以總代售處的名義來協助銷售的。其時他們三人在北京文壇上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秦賢次稱「在抗戰時期的北平，張我軍、洪炎秋、張深切三位可說是臺灣作家的三劍客」²⁰。至於林海音在當時曾經任職過《世界日報》記者。然而他們與鍾理和之間卻都不知悉，究其因，一方面可能因為鍾理和文學事業的真正開啓，是在他到達中國大陸以後，之前在文學啓蒙時期，所留心與接觸的皆為中國新舊文學與日文版的世界文學，對於正在萌芽發展的臺灣文學似乎所知不多，因而對這些臺灣文學的前輩作家自不熟悉。另一方面便是他的個性與對文學事業的虔誠與執著。正如他在歸台後給擔任聯副主編林海音的一封信上曾經提及：「我性不喜應酬，這是一，再加上專心讀寫，因此六年間極少出現交際場所，即在同鄉之間亦默默無聞。」（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與林海音信《鍾理和全集》6，頁150）此外，「同姓之婚」的禁忌所給予他們的壓力，也應是鍾理和不願與同鄉之人多所聯繫的主要原因吧！

北京是中國文化的故都，也是五四文學運動的發源地，這對下定決心要做一

¹⁹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28。

²⁰ 秦賢次，〈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張我軍〉，《傳記文學》第55卷第6期（1989.12），頁130。

個「中國作家」的鍾理和而言，這裡應是可以提供他眾多資源的最佳文學修業之所。雖然，當時他與在京的台籍文人可說是幾乎無接觸，也沒有其他資料可證明他與當時北京文人有所往來，然而正全心全意為一己崇高神聖的文學志業進行修業與準備的鍾理和，勢必大量的吸收所有關於文藝的訊息，舉凡報章雜誌抑或文學出版品。這一段的文學經歷，目前除了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到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的日記外（以下簡稱「北平日記」），鍾理和並沒有留下任何其他資料可資佐證，所幸這短短四個月間，他的日記寫得很勤，而且所記又翔實，透過這些內容，我們當可窺知一二。

經過筆者仔細披閱這段期間的日記內容，我們發現鍾理和文藝資訊的最主要來源是透過報紙。在日記裏他所提及的報紙名稱便有《平津晚報》、《正報》、《華北日報》、《東亞新報》、《世界日報》與《大公報》六種之多。他也不只一次的在日記中提及他在整理舊報紙，以「參之以發展於此舊報之後世界新情勢」（《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日記》5，頁8）。日記中更多的是記載他針對報紙上所刊出的社論、時事或是文藝版中的文藝作品作鞭辟入裡的批評。從這裡我們可以瞭解，鍾理和不僅關心文藝的發展，對其時政治、社會的情勢，也多所注目。這與他一向主張強調文學的社會性是相一致的。此外，日記中也出現了三種期刊，分別是《光華週刊》、《糧》與《創作》。其中前兩種應是屬於綜合性雜誌，而後者則為新刊純文藝雜誌。據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卷》附錄（一）〈戰時戰後文壇大事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之記載，《創作》創刊於戰後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北平。而根據「北平日記」的敘述，他讀此雜誌的日期為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可見他相當迅速的掌握了當時文壇的最新動態，他一直保持做為一位認真的文藝工作者，所應對文壇狀況持續高度的注意力。日記中還出現許多他當時所交往的友人，諸如邱連奇、藍明谷、謝人堡、李昌時、李輝文、林英南等。邱連奇是鍾理和的姑表兄弟，常接濟他的生活。其餘諸人都是由臺灣前去北京的同鄉，他們都對文藝有所喜好，都是能與鍾理和分享文藝創作或暢談文藝理念的人。由此看來，鍾理和在北京的文藝圈子並不大，尚未能進入當時的主

要文壇。

鍾理和的文學啓蒙讀物，主要來自於中國的新舊體小說，尤其是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幾乎令他廢寢忘食。這對身處中國文化古都北京，欲成爲「中國作家」的鍾理和而言，隨手可得的新文學作家作品無疑是其最佳的修業模範。因此在這短短四個月的日記中，仍出現了郁達夫、林語堂、周作人、魯迅、柳雨生、陶亢德、關永吉等三〇、四〇年代的作家名字。其中鍾理和只是提及郁達夫於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在蘇門搭拉失蹤，似爲日人所劫的消息；柳雨生、陶亢德、關永吉皆列漢奸名單中。而林語堂、周作人的出現，則是因同鄉北大化學系教師陳先生，批評《夾竹桃》所表示的態度是與林、周二氏、張我軍先生同爲有閑主義的作家的。日記中，最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提到魯迅，不論在次數與篇幅上都是最多的，這正顯示了魯迅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北平日記」開始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不久就出現了有關魯迅的記載：

今天是我民族的戰士魯迅先生逝世九週年紀念，平市各報章莫不鄭重其事的為刊登紀念和輓弔魯迅的文章，而提供了很大的篇幅。（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日記，《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日記》5，頁28）

在這則日記裡透露了幾個訊息：一、當時爲日本勢力籠罩之下的北平文壇，魯迅的影響未曾減退。二、鍾理和平時即有廣泛閱讀報紙的習慣，而當時所刊載有關魯迅的文章，想必他都仔細閱讀過，因爲隔天的日記就又出現有關魯迅的記載：

魯迅先生的敵人增加了，戰友增加了，戰線也延長了。但這時候他仍然發現它的老朋友，那手下敗將阿 Q 出沒於敵方，甚至可哀的混進自己地戰線裡，這使他好笑、高興、然而也無聊——他早已不把阿 Q 當作唯一的戰鬥對手了。——歐陽山：魯迅主義。

他常常鼓勵年輕人做種種工事……但他自己像老於捉蛇的有癮的人一樣，有時隨手一撈就捉起一個活蹦的阿 Q。——歐陽山（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日記，《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二日日記》5，頁29-30）

歐陽山的這篇〈魯迅主義〉是發表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的北平《中華民國報》上。他是三〇年代年輕的左翼作家，一九二七年在廣州曾經與魯迅有過較為密切的往來。當年一月首次與當時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的魯迅見面；三月十四日廣邀廣州文學界朋友成立「南中國文學會」，魯迅亦出席指導；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為魯迅所做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演講做紀錄。而後在一九三六年參與兩個口號的論爭，用龍貢公的筆名寫文章擁護魯迅所提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並與魯迅有過短暫的通信。魯迅死後，不僅親自參加魯迅的殯儀和葬禮，還陸續在周年忌日時發表〈一個夠膽的男人〉、〈魯迅精神底永遠的敵人〉、〈一個人靜悄悄地〉、〈怎樣紀念我們底巨人〉等紀念魯迅的文章。²¹歐陽山與魯迅既然具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其對魯迅思想的理解，自然是值得參考的，因此鍾理和在日記中摘錄了這些內容，實際上是欲藉歐陽山對魯迅的理解，來抒發他對當時政治社會情勢的不滿。自抗戰勝利以來，在熱鬧陶醉的氣氛下，鍾理和所發現的中國依然是過去那個頹廢萎靡、腐敗、貪官污吏橫行的中國，仍舊是那個「第一個官僚，第二個官僚，第三個還是官僚！」（《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九日日記》5，頁18）的社會，原來在偽政權下得意過一時的「漢奸」，搖身一變又成了熱烈的愛國者。偽善、敗德、趨炎附勢種種的國民劣根性彷彿是一個個的阿 Q 出現在眼前，魯迅厭惡而且可以輕而易舉的便識破他的面目，鍾理和同樣也認清他們的假面具並施以不屑的態度。

面對混亂的時局，徬徨的人心，鍾理和內心興起了無奈的情緒，文學的無力感深深地包圍著他。他在日記中吐訴了他的心思：

魯迅的路子——。魯迅的路子在現在是行不通的。他太激烈、太徹底了。把這法子適用於現在，那是傻子才肯做的。因為這不啻自動的斷絕了昇官發財的機會。一輩子甘願做奴才。聰明人是不走這條路子的。

又一個魯迅的路子——。魯迅本來是學醫的，在仙台醫專，因在課餘

²¹ 有關歐陽山與魯迅之間的關係，可參馬蹄疾編著，〈魯迅與歐陽山〉，《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下卷）（瀋陽：春風出版社，1985），頁122-124；歐陽山，〈光明的探索〉，《歐陽山文集》第10卷（廣東：花城出版社，1988），頁4149-4172。

的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做俄國的奸細被日本人牽去砍頭時，一陣心血來潮，遂拋下他的解剖刀與白披衣跑到文學裡去了。

他以為想要救中國捨文學無他，而它是最快的方法。

然而俗語說得好，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魯迅先生在這裡竟大大的算錯了。他還不如快去茅山，由茅山老祖借來一把斬妖劍呢！印在紙上的冷冷的字究竟是無用的，他不如向準橫行在白日下的妖魔鬼怪們的脖子上「嚓」的一刀劈下去管事。我相信只有去掉那一小部份或者是大部份的人，另一部份的人才能得救，才有法子活下去。而欲去掉那一部份的人，大概除開殺頭以外，是沒有更好的辦法的。（《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記》5，頁36）

魯迅之所以棄醫習文，是因為他認為愚弱的國民，只能是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只有改變他們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於是他一頭栽進了這以啓蒙為目的的文藝運動。但是當他在北京經歷了「三一八慘案」，體驗了政府的權勢壓逼時，他深切地以為「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魯迅全集·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3，頁416），對文學產生了空前的無力感。在日記中，鍾理和似乎對魯迅的以文藝救中國的道路不以為然，實際上不也就表示了他所走的道路也就是「魯迅的路子」？面對抗戰勝利前後的中國，只不過是「平」「京」二個字的更換而已，國民的劣根性依舊，政治的腐敗與社會的墮落在本質上並無二樣，鍾理和對原鄉的憧憬徹底幻滅，對文學所能產生的社會力量也同樣生疑，他甚至認為要把那些橫行的妖魔鬼怪殺頭，中國人才有復興的希望。這與魯迅的憂心一般，他曾說過：「如果中國人再不死一些（由於饑饉和自相殘殺），和平不會到來吧？」²²鍾、魯二人都冀望著中國的未來，那是「恨鐵不成鋼」的焦慮啊！學者澤井律之也曾以這則日記內容，來與魯迅結合，說明兩人之間的關係：

²² 增田涉著、鍾敬文譯〈魯迅的印象〉，收入《魯迅回憶錄》專著（下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1358。

鍾理和這樣批判魯迅，應該把它解讀為他是藉魯迅這個文學家，焦躁地置身於困境中，凝視文學的無力和鍾理和自身的無能，再次質問自己文學的意義何在。換個角度來看，這表示出鍾理和如何閱讀魯迅，並受其影響吧。對鍾理和來說，所謂中國的現代文學是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文學上最為重要的規範，這是殆無疑義的。²³

三、原鄉幻滅與「二二八」事件

(一) 原鄉的幻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歷經八年的浴血抗戰，終於獲致最後的勝利，原本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臺灣，根據波茨坦宣言的內容，也一併結束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這對絕大部分為了逃避日本殖民統治而旅居大陸的臺灣人民而言，當是雙重的喜悅，然而由於國人對台胞嚴重的誤解與歧視，這喜悅卻沒有維持太久。

鍾理和在戰後曾經寫下兩篇重要的文字做為時代的見證，它們分別是〈白薯的悲哀〉與〈祖國歸來〉。前者寫於戰後的北平，主要描寫當時旅居北平的臺灣人的悲哀，並且發表在「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機關刊物《新臺灣》第二期上；後者寫於返台之後，為一未完稿，主要描寫戰後旅居華北的臺灣人所遭受的歧視與屈辱的不公平待遇。由於政治情勢的嚴峻，七〇年代張良澤主編《鍾理和全集》時並未收入，直到一九九三年才披露於九月十日、十一日的《聯合副刊》。

中國抗戰的勝利，對於旅居中國各地的臺灣人而言，「他們的高興、欣忭，是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大，都要熱烈。」因為「於今後，他們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鍾理和全集·白薯的悲哀》3，頁2）在這種愉快和興奮的氣氛中，各地紛紛成立了臺灣同鄉會，「主要功能係辦理同鄉登記，發給會員證；安排轉運船隻；協助救濟失業鄉人；成立訓練機構，訓練原為軍伕、軍屬完全不懂華語的鄉人學習國語等等。」²⁴旅居北平的臺灣同胞也很快地組織起來，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

²³ 澤井律之，〈關於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未名》第七號（1988.12）。

²⁴ 秦賢次〈《新臺灣》導言〉，收入於《新臺灣》覆刻版（台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日在北平西單大光明戲院成立了「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其目的「最重要的是全力與政府各單位連繫，安排船隻讓滯留北方的臺灣同鄉能儘速返鄉。」²⁵並曾以同鄉會的名義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表達旅平臺灣人對政府抗戰勝利，協助臺灣同胞重返祖國的感激與謝忱。然而，祖國回報給台胞的卻是漠然、不關心與無盡的歧視、屈辱。透過鍾理和在〈白薯的悲哀〉一文與戰後在北平所寫的日記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在同鄉會成立的當時，台胞是多麼熱烈殷切的盼望來自祖國的祝福，然而中央政府卻沒有來賓蒞臨。由於「國人對臺灣的山海經式的認識與關心」（《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日日記》5，頁11），所以認識是不正確的，總認為台灣人已被奴化，視其為「日本人的間諜」²⁶；而對臺灣人所表現的關心，卻總是帶著侮辱與譏諷的。例如有人問要買國旗的臺灣人孩子：「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或是指著報紙日本投降的消息問臺灣人說：「你們看了這個難受不難受？」等等如此令台胞深感侮辱與貶抑的言語。更有甚者常把台灣人與朝鮮人相提並論，在報紙上登著「朝鮮人怎麼樣，臺灣人又怎麼樣」的話，刻意貶抑台胞的地位。又對台胞稱呼為「臺灣人」，就如同過去日本殖民統治者般，存在著差別、輕視、侮辱等等的意味。在如此惡劣的環境裡，在北平的臺灣人只好以「白薯」——宿命的島嶼，由尾巴倒提起來，像一條白薯——自稱，如同昆蟲的保護色，因為「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臺灣人，那是很不妙的。那很不幸的，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鍾理和全集·白薯的悲哀》3，頁3）

戰後歸台寫成的〈祖國歸來〉，鍾理和再一次地把祖國對台胞的誤解與歧視，做出沈痛又有力地控訴。當全國人民普遍沈醉在抗戰勝利的喜悅時，因「生活的牽連與環境的累贅更將他們係於偽政權之下」（《鍾理和全集·祖國歸來》3，頁12）的臺灣人，卻因偽政權的隨之解體，「在接收即等于停辦的政治現象下，失

²⁵ 秦賢次〈《新臺灣》導言〉，收入於《新臺灣》覆刻版（台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²⁶ 鍾理和的遺孀鍾台妹，在一次受訪的內容中，回憶當時回臺的原因說：「唉！不回不行啊！那時候，日本戰敗了，我們在那邊的臺灣人，都被當作日本間諜一樣看待，鄰居對我們很不客氣，想著家裡還有田，還是回家好，就同北平的一些臺灣人一起回來了。」見王麗華〈鵝鵝之情——夜訪鍾台妹女士〉，《台灣文藝》1卷54期（1977.3），頁52。

業者塞遍街頭，且正與日俱增」(頁 13) 的情形下幾無立身之地。歸鄉似箭的上千流落在華北的台胞，卻又因原擬載人的海蘇號賣「黑票」，而拋下諸人出航了。這種種施諸臺灣人的不公平待遇，毋寧是令人心寒的。然尤其荒唐的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國民政府透過報紙的登載，向全國頒佈了「關於朝鮮及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一) 凡屬朝鮮及臺灣之公產，均收歸國有。(二) 凡屬朝鮮及臺灣人之私產，由處理局依照行政院處理敵偽產業辦法之規定，接收保管及運用。朝鮮或臺灣人民，凡能提出確實籍貫，證明並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或憑藉日人勢力，凌害本國人民，或幫同日人逃避物資，或並無其他罪行者，確實證明後，其私產呈報行政院核定，予以發還。辦法中把台灣人與朝鮮人等而視之，顯然有「非我族類」的歧視之意；把台人私產依處理敵偽產業辦法接收，也就是把台人視為敵或偽，充滿了對台人的誤解與不信任；先入為主的認定台人有擔任日軍特務工作等等的罪行，表現了對台人的污蔑與偏見。這種種透顯出來的訊息，對當時全國各省市的台胞莫不產生極度的震撼，咸認為這是一種極大而無法忍受的侮辱。我們透過「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機關刊物《新臺灣》來看，創刊號中除去〈創刊詞〉外共收十六篇長短不一的文章，其中就有六篇論述此辦法之不妥，力陳臺人在異族統治下的尷尬處境與強烈的民族意識，籲請政府收回成命。其中還提及「臺灣省旅平同鄉會」與「臺灣省革新同志會」共同為此事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對外發表聲明，表達臺人反對此辦法的立場與理由。可見此事對於甫回歸祖國的臺胞心靈，造成了多麼巨大的傷害。之後，準備由天津搭船回臺的臺民，竟要與回國的日韓僑民同樣待遇，必須接受身體與行李的檢查，這不啻在尚未癒合的傷口上，再灑上一層鹽巴，是那樣地令臺胞痛徹心扉。鍾理和在〈祖國歸來〉中曾說：「臺灣人不被禮遇，各處受到歧視、欺負，與迫害。唯奇怪的是，此歧視、欺負與迫害，卻都受自國家。國家對人民拿起報復手段，已是天下古今咄咄怪事，而我們則實實在在的不知道國家要對我們報什麼讎。難道臺灣人五十一年奴才之苦，還不夠嗎？難道臺灣人都個個犯著彌天大罪，應該『誅及九族』的嗎？」(《鍾理和全集·祖國歸來》3，頁 15) 衡諸

作者創作當時，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理下的臺灣本島，其歧視、欺負與迫害的情形與大陸並無二致，相信這正恰如其份地表達所有當時在大陸及臺灣本土安分守己的臺灣人的共同心聲。

原先爲了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懷著滿腔的民族熱血，千辛萬苦才到達北平居住的臺胞，「在如上物心兩面的夾攻、壓迫，與威脅之下，於是，臺灣人便不能不離開住慣了的祖國，逃回臺灣。」因此爲了反抗「同姓不婚」的陳腐封建思想，追求成爲「中國作家」的理想，抱著誓死不回決心出走大陸的鍾理和，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搭上難民船，輾轉自天津、上海到基隆，終於還是踏上了睽違多年的臺灣故土。鍾理和在民國十九年於松山療養院接受胸腔整型手術，面臨生死關頭之前夕，曾於日記中留下給其妻子的遺書中說道：「我們在外面漂流了八年，在光復的次年，抗不過鄉心的引誘，終而回到南海的臺灣。」（《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日日記》5，頁132）似乎回臺的主因是「思鄉情切」，然而根據前述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的瞭解「鄉心的引誘」的背後，其實是來自於對「原鄉徹底的失落」。

（二）見證「二二八事件」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鍾理和一家三口終於抵達基隆，翌日乘坐火車到達高雄，暫住弟弟里志家。不久，便應聘屏東縣立內埔初中教師，擔任代用國文教員。當時的校長爲鍾璧和，爲鍾和鳴在臺北高校的室友，雖非教育專業出身，但對教育工作充滿熱誠，秉持著「自由意志」的教育理念，要求必須「以自動作爲出發點」，希望「人們都能夠在最崇美的東西裡，把自己真正地充實起來。」

（《鍾理和全集·校長》3，頁89）學校的教員都被這位對教育工作充滿高度的熱忱和擁有高尚的人格校長所感化，每個人爲了蒐集、補充與製作教材，都忙得焦頭爛額，然而在疲勞之餘，卻充滿對工作滿足的愉悅之情。校園雖簡陋，但「那種最富鼓勵的性質的東西，在激盪著每一個人的內心。建設、創造、成長、覺悟，就是這些象徵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希望的東西，像一隻爬蟲，在匍匐，而且翻騰。」（頁86）甫自大陸逃歸臺灣的鍾理和，歷經對中國人國民性的墮落、

政治的貪污腐敗與社會的無情黑暗，充滿了無盡的絕望、失落與空虛，帶著「白薯的悲哀」，在不得已的情勢下才再度回歸故園。然而初踏上故鄉的土地，目光所及，盡是一片怵目驚心的殘破景象：紊亂的秩序、髒亂的環境、乾旱欠收的土地與人們枯竭的心靈，透過〈海岸線道上〉（未完稿）與〈故鄉〉的作品描述，我們很容易便讀出鍾理和字裡行間所透顯出的憂鬱、失望與不滿的情緒來，這與在〈夾竹桃〉中往往透過來自南方（其實就是指臺灣）的曾思勉雙眼，及其所「富有熱烈的社會感情，而且生長在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暱的鄉人愛的環境」（《鍾理和全集·夾竹桃》2，頁111）的背景為對照，而對中國的國民性進行強烈的批判時的臺灣形象，實有天壤之別。彭瑞金在論述〈校長〉一文時認為：

帶著失望、挫折和憤怒從「祖國歸來」的鍾理和，在這篇作品裡一再使用「希望」、「正直」、「純潔」、「翻騰」……等活力充盈的字眼，那是需要對照他的中國經驗作品才讀得出來的經意和不經意的表露。²⁷

對照鍾理和的中國經驗並不愉快，他對中國人喪失了生命的尊嚴與任由人性墮落的生活相當失望，因此對於校長所堅持的「自由意志」的教育理念有所保留，令他「很懷疑一個人是否可以隨便利用和依靠人那種脆弱的善性，而不會有所差失」（《鍾理和全集·校長》3，頁91）。但是從校長與教員對重建臺灣的亢奮與熱情上，他又重新看到了生命的尊嚴與人性的光輝。雖然戰後殘敗不堪的故鄉，曾經令他失意、落寞，但由這地處偏僻的地方教育事業上，他感受到故鄉源源不絕的希望與力量，於是鍾理和用他的文字，刻畫了一個「正直、純潔、沉穩與堅定」的靈魂，「把戰後初期瀰漫全台各地人民對興學辦學的熾烈熱意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留下了一個珍貴的歷史見證」²⁸，展現了戰後臺灣知識份子的典型²⁹。不過，這種重獲希望的喜悅並沒有持續多久，民國三十五年八月鍾理和便因肺疾病倒任所。翌年正月，肺疾惡化，北上至台大醫院診療。二月底，震驚海內外的「二

²⁷ 彭瑞金，〈鍾理和小說《校長》〉，《台灣文藝》第2期（1994.4），頁76。

²⁸ 鍾肇政，〈鍾理和筆下的「校長」〉，《自由時報》41版（1998.11.30）。

²⁹ 彭瑞金曾在〈鍾理和小說《校長》〉一文中認為「作者顯然把他當做戰後臺灣知識份子的典型」，見《台灣文藝》第2期（1994.4），頁75。

二八事變」發生，好不容易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再度陷入動盪不安的政局中。鍾理和以日記的形式與冷靜鎮定的筆調，客觀記載了他對此一重大事件的敏銳觀察。

鍾理和對「二二八事變」的記載僅有三天，日記的內容是以鉛筆寫在幾張殘破的筆記簿上。觀看原稿的筆跡，隨著時局的日趨嚴峻，似有漸趨凌亂之勢，透露出鍾理和焦慮的心情。而根據《鍾理和全集》5 文前所附錄的照片，在二月二十八日的藥袋背面，亦留有零星的記錄，前半內容為：

種子。隔膜、米。一百多萬。

下午枝水與林女□（按：無法辨認）

三日

黃朝琴，強硬派。

四日

……

據此內容，「三日」之前的兩行，應是二日的日記內容，對照現存「二二八日記」中三月二日的記載，大相吻合，我們相信藥袋背面的文字，是在倉促之間因應無紙之窘，所記錄下來的梗概，只是作為日記的大綱，而後覓得筆記簿後，才據以寫下他完整的觀察與思考。而現存「二二八日記」的記載只到三月二日，而藥袋背面上還記錄至四日，因此後面應還有遺佚。

相對於前二年「北平日記」的慷慨激昂，「二二八日記」的筆調顯得格外的冷靜客觀。面對戰後初期台灣那一段最為沈痛、慘烈的血淚歷史，鍾理和不疾不徐，緩緩寫來，彷彿如攝影機般，靜靜地一幕幕地將所有他眼中所見、耳朵所聽的各種事件，忠實詳盡的記錄下來，絕少有主觀的議論。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變動，鍾理和在文字上的表現，似乎與之前有了絕大的轉變。究其因可能有二：一是其時鍾理和因肺結核病情惡化，北上進入台大醫院診療。而肺結核病在當時是不治之症，死亡率相當高，值此生死關頭之際，看待事物的態度自然有所轉變。一是面對陳儀政府在台灣的貪污腐敗，彷彿抗戰勝利初期國民政府在北京統治的

翻版，難免有「哀莫大於心死」的感喟。試看「北平日記」的記載：

自唱政治刷新官吏肅清以來，為時已久了。但似乎《官場現形記》尚有重寫的必要。也許於中國它是寫不完的一部小說。（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日記》5，頁22）

淪陷時如此，於今光復而後仍復如此，我們還能說什麼？（《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九日日記》5，頁38）

前日有人在報上——無疑這位先生是已嚐遍了做人、作中國人的味道的一——感喟地說這年頭不但朝中無人莫做官，並且也是朝中無官莫做人。（《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一日日記》5，頁54）

貪官污吏、腐敗無能、通貨膨脹與民生困苦，這就是戰後的中國所有的一切，人們並沒有因為抗戰勝利帶來任何切身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禍害。逃歸故鄉的鍾理和，面對戰後初期台灣政治、社會環境的亂象，似乎在北平所經歷的種種又再度上演，其失望、痛心是可以想像的，這時縱使其心中有再大的不平，然而「如果不平超過了不平的時候，則物將忘記它的鳴了。」（《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一日日記》5，頁55）鍾理和深刻的瞭解，在面對專制強權的統治者，「印在紙上的冷冷的字究竟是無用的」，只有堅持一個文字工作者的崗位，冷靜客觀的紀錄下此段人生經歷。

當鍾理和對中國原鄉產生徹底破滅，而風塵僕僕地回到故鄉台灣之際，正是魯迅文學在台灣文壇張皇之時。面對闊別八年的故鄉，一片破敗凋零的景象，令他內心充滿失望與惆悵；歸台後謀得的教職，未及半載，便因肺病而不得不辭退。這段期間，他面臨了生命中的又一個寒冬，但他從不曾忘記「作家」的身份與使命，除了以筆名「江流」發表〈生與死〉在《台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上，他還寫了〈校長〉、〈海岸線道上〉（未完稿）、〈祖國歸來〉（未完稿）等作品。雖然沒有任何具體證據顯示這段期間在台灣廣泛傳播的魯迅思想，對鍾理和其人其文產生何種的影響，但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現存的「二二八日記」中，載有「晌午前藍先生至。他是由基隆搭載貨車來的」（《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

日日記》5，頁 67)。此處的藍先生與「北平日記」中的藍是同一個人，也就是在戰後初期曾翻譯魯迅〈故鄉〉的藍明谷。藍明谷是鍾理和在北平時常相往來並能談論文學的少數台灣人之一，我們由「北平日記」中他出現次數之多，以及藍經由鍾的介紹，前往鍾和鳴主持的基隆中學任教的事來看，可以想見兩人感情的深厚，見面的次數也絕不止於日記中記載的一次而已。藍明谷對魯迅文學理解的深度已如前一章所言，鍾理和又是如此的醉心魯迅文學，甚至批判魯迅以作為自身困境的曲折映現，兩人面對台灣如此冷峻肅殺的政治情勢，所抱持的觀點或許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魯迅的影子，而鍾理和〈祖國歸來〉中那種直接且痛心的對祖國的控訴，也可以看做是魯迅「匕首式」文風的遺緒吧！

第三節 五〇年代的鍾理和與魯迅精神

鍾理和在 1947 年 10 月因肺疾入松山療養院，一直到 1950 年 10 月出院回家的三年時間裡，面臨了死亡挑戰，最後終於以其堅強的意志力與醫療的進步，戰勝了病魔。他在療養院的最後一年，留下極為完整的日記，提供我們相當珍貴的資料，以瞭解這個時期的鍾理和生活。透過日記內容的披閱，我們清楚的可以知道，以作家為終身職志的鍾理和，並沒有放棄他的文學生命，他仍利用病中有限的體力，孜孜矻矻的進行他的文學閱讀與寫作。他閱讀的內容不論中外，但主要還是集中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對魯迅作品的著墨更深。他在 1950 年 3 月 23 日的日記中提到因閱讀沈寂的〈鬼〉，其中一名老嫗的角色，讓他又想起〈祝福〉中的祥林嫂，因而感嘆中國人的命運就該如此麼？3 月 30 日的日記中記錄看完《華蓋集》，而此前後的日記內容，主要又是記載與病友們對中國國民性的討論，而《華蓋集》的內容恰好又是魯迅作品中談論國民性最頻繁的一本文集，自然鍾理和在參與這些討論時，魯迅文集中的國民性思想是不可能不給予啓發或參照的。這段時間鍾理和已又重拾禿筆，繼續他的文學創作，記錄戰後台灣農村荒涼景象與饑渴人心的〈故鄉〉四部，就是創作於此時。他在 1950 年 4 月 3 日的日記中記載：

讀〈在酒樓上〉。寫「如此故鄉」之一的〈竹頭庄〉，約得一千字。眼高手低，筆不從心，寫來深覺惱恨。魯迅引過他所忘記了名氏的人的話：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然後說常在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然而，於我，最感苦惱的，還是會話的處理。（《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三日日記》5，頁92）

他所引有關魯迅的那一番話，是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表達他對人物刻畫方法的觀點，〈在酒樓上〉是收錄在魯迅第二本小說集《彷徨》裏的短篇小說。雖然刻畫人物並非鍾理和的困擾，但就整個日記內容來看，他在創作時以魯迅作為模範，吸收相關文學創作技巧的情形是確實存在的。甚至可以更大膽的推測，就是鍾理和在閱讀魯迅作品中獲得啟發，揉合自己的現實遭遇，用著自己書寫的方式形成自己的創作。日人澤井律之曾以鍾理和與魯迅的同名〈故鄉〉作比較，確實發現兩人在結構與敘述上的相似。³⁰此外，鍾理和又在日記中摘錄橫光利一《歐洲紀行》的文句：

午前九時半，安抵上海……在內山書房內有魯迅氏和實彥氏（山本實彥？）及內山書房主三人。魯迅氏據說因為昨夜漏夜為《改造》寫稿，臉色蒼白，卻鬍子很濃，齒列很美。……（《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九日日記》5，頁100）

這本在日記中自言看過數遍卻無法看懂的書，為何獨獨只摘錄有關魯迅的文字？想來臥病在院的這段無聊、苦悶的治病時期，有關魯迅文字不斷的出現，並非只是一種偶然，他代表著魯迅在鍾理和文學心靈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不管在文學閱讀、創作或討論上，都成為他不可或缺的參照對象，也是鍾理和文學形成的其中一部份。

病癒歸家到逝世的人生最後十年，鍾理和因羸弱的身軀不堪任何工作的重壓，只有擔任過鎮公所里幹事與土地代書工作，前者只有短暫的數個月，後者也

³⁰ 澤井律之，〈兩個《故鄉》〉，收入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99-102。

不過一年多，其他時間幾乎都還是僻居鄉間，繼續他閱讀與創作的文學生涯。但以他居處鄉間的封閉環境，與時代潮流不合的文學風格，自然難以尋獲文學的知音，他所走的是一條寂寞淒清的文學道路，不被理解同情，也無鼓勵慰勉，一直要到他在 1956 年獲得中華文藝獎金長篇小說第二獎，在文壇嶄露頭角，並因此得識《文友通訊》諸文友後，他的文學生命才開始發光發熱，他的文學能量才得以釋放，無論在質或量上的爆發，都是前所未見的。

台籍作家在五〇年代的處境極為尷尬困窘，語言文字的隔閡與障礙，迫使他們幾乎把全般心力用於學習中文。雖然文字流暢不足，技巧未臻成熟，然而澎湃的創作企圖，讓他們一個個漸漸嶄露頭角。一九五二年廖清秀以〈恩仇血淚記〉獲文獎會第三獎，同年李榮春以〈祖國與同胞〉獲得稿費獎助；一九五六年鍾理和以〈笠山農場〉獲文獎會第二獎，同年文心亦獲創作獎金。此外，鍾肇政也曾向文獎會投過幾篇稿子，雖未曾得獎，但有些也給了稿費。³¹一九五七年鍾肇政在與廖清秀的通信中，提及有關台籍作家的動態，唯彼此之間非但未曾聯繫且互不相識。尤其在外省作家壟斷文壇，反共文學當道的年代，彼此的境遇雷同，且志同道合，實有「切磋砥礪、互通聲氣」³²的必要。於是鍾肇政計畫以油印方式編印《文友通訊》，並以通信方式徵求當時所能得知的台籍作家共同參與，最初有陳火泉、鍾理和、李榮春、施翠峰、鍾肇政、廖清秀、許炳成（文心）等七人，後又加入了許山木、楊紫江二人。《文友通訊》的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作品的輪閱與合評，一是文友近況報告。自一九五七年四月至次年九月，共持續一年半的時間，發行了十六期。其中聯絡文友，互相激勵，互相關照的目的可說是達成了，作品的輪閱與合評，也有一定的成果。十六次的通訊裡，共討論過鍾肇政〈過定後〉、陳火泉〈溫柔的反抗〉、廖清秀〈恩仇血淚記〉、文心〈千歲檜〉、施翠峰〈愛恨交響曲〉、許山木〈苦澀的愛情〉、鍾理和〈故鄉〉、楊紫江〈前世

³¹ 鍾肇政先生口述。轉引自蔡其昌，《戰後（1945～1959）台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1），頁 176。

³² 鍾肇政在日後論述《文友通訊》時，多次認為這是興辦時的最大目標。鍾肇政，〈也算足跡——『文友通訊』正式發表贅言〉，《文藝界》第 5 集（1983.1），頁 120；〈春夢了無痕——三談《文友通訊》〉，《台灣史料研究》第 9 期（1997.5），頁 29。

因緣)、李榮春〈歉疚〉等共九篇作品，每次都能獲得文友們或多或少的中肯而實際的批評。這樣的屬於文友內部的私密刊物，相對於當時五〇年代的文壇來說，實是無足輕重的，但對於鍾理和個人文學生命而言，卻是激起他再度為其鍾愛的文學奮鬥不懈的最大動力。

在參加《文友通訊》前，無論在大陸瀋陽、北平時期，或是戰後回臺、歸鄉的階段，鍾理和從來不曾參加任何文學團體，在文學的道路上一直是踽踽獨行、單打獨鬥的³³，尤其自松山療養院回到美濃故居後，偏僻落後的鄉村生活，沒有人理解他的創作工作，沒有人可與之談論文學³⁴，一方面背負著健康與生活的雙重壓迫，一方面又因「同姓婚姻」必須承受鄉人異樣的眼光，再加上愛子夭折，那種孤苦、淒涼、悲怨、憤恨、無奈與自責的心情，怕不是任何人可以感同身受的。《文友通訊》的適時出現彷彿黑暗中的一盞明燈，對鍾理和不啻是莫大的鼓舞，這是他一生中唯一參加過的文壇活動，對其文學生命的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當鍾肇政發函倡議組成《文友通訊》時，鍾理和是第一個給予熱烈回響的，並在回信中表達他「心中喜慰莫可名狀」。之後他在給鍾肇政的一封信上又說：

我灰心此道已久，自有《文友通訊》之舉後，無形中受了鼓舞，又復拿起筆桿，是否寫得出像樣的東西，尚在未知，還望各位文友不吝賜教。（《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鍾肇政函》6，頁18）

鍾理和因文獎會停辦，其機關刊物《文藝創作》也隨之停刊，得獎作品《笠山農場》不僅無法有刊行或出版問世的機會，甚至連原稿都無法取回。再加上貧病交迫、地處偏僻，相關文藝資訊難以獲得，而所從事的文藝創作，又與當時文壇的取向背道而馳，往往成為「退稿專家」。所幸此時《文友通訊》的成立，讓原本孤獨寒冷的文學心靈，適時的注入一股暖流，鍾理和的文學熱情再度被點燃。

³³ 鍾理和曾自敘他的寫作生涯：「由我開始學習寫作起，一直至今，既無師長，也無同道，得不到理解同情，也得不到鼓勵和慰勉，一個人冷冷清清，孤孤單單，盲目地摸索前進，這種寂寞淒清的味道，非身歷其境者是很難想像的。」（《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廖清秀函》6，頁95）

³⁴ 鍾理和在給鍾肇政的信中便曾提及在他的生活中「嗅不出一點文藝的氣息：它是平凡、庸俗、零碎，充滿了憂愁、艱難、疾病和苦悶。我個人在這裡獨往獨來，不為人理解和接受，沒有朋友、刊物、文會……。我常常會忽然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廖清秀函》6，頁37）這裡非常全面地概括鍾理和本人僻居遠地的窘況。

由前述可知，《文友通訊》成立的目的其實再單純不過，然而在那風聲鶴唳、陰雲與寒霜籠罩的戒嚴時代，卻還是引來不少爭議。當鍾肇政興致勃勃第一次發出信函徵求文友的參與時，就收到一名文友來函「暗示此舉恐干禁忌，希望我的企圖歸於失敗！」³⁵此舉讓鍾肇政覺得異常悲哀，但並無動搖其推動《文友通訊》的決心，只有取消擬定名為《文友通訊》的刊物名稱，改採通函方式以個人名義寄發通訊，其餘作品輪閱評論，以及文友近況報告的內容仍舊不變。對於此文友的立論，鍾理和並不表贊同，他在回鍾肇政的信函中表示：

關於《文友通訊》一事，後來我再仔細想想，覺得祇要我們立場清楚不干涉政治時勢則有何干犯可言？那位文友，顯過杞憂。祇是人數太少，還是希望所有省籍文友們能全部參加。今接得清秀兄來信也提及此事，他與我同感，認為通訊是我們目下所切需，不可因少數人的異議而作罷，……（《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鍾肇政函》6，頁3）

其實，在國家機器掌控一切的「白色恐怖」年代，文友之間最能實際感受到政治壓逼的嚴峻，當非鍾理和莫屬了。他的弟弟鍾和鳴、姑表兄弟邱連球，三人是一起長大的好友，同樣自小便具有淑世的理想，然在五〇年代初，卻同因「基隆中學案」而先後罹難。他在北平的摯友藍明谷，後來亦因叛亂罪而遇害。鍾理和雖然因病逃過一劫，但是特務搜查的惡形惡狀，卻是親身經歷，令他餘悸猶存。³⁶在那不能隨意結社的年代裏，滿懷文學理想的鍾理和卻不因此而膽怯畏懼，他不願輕易放棄難得的文學知音，並且還堅定的認為「兄此舉的意義將來必有不可磨滅者，我們必先有所耕耘然後才能有所收穫，我們無妨給將來的台灣文學豫鋪道路吧。」（頁3）鍾肇政在第一次的《文友通訊》中，把諸台籍作家文友定位為

³⁵ 見第三次《文友通訊》內容，收錄於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出版公司，1998），頁321。

³⁶ 筆者在訪談鍾鐵民時，他曾經追憶當時的情形：「記得有一次情治人員為了捉拿我的叔叔，跑到家裡來搜查，屋裡上上下下都被翻過，整間房子如同經歷一場浩劫般。當時父親剛出院回家療養，這些情治人員便大聲問道：床上臥的是誰？母親急忙向他們解釋，父親因肺病剛開過刀，他是鍾里志的哥哥鍾理和。這些情治人員並不相信，拿起手電筒便向陰暗的床鋪上照，甚至還粗魯的將父親的衣裳撥開，檢視是否真有開刀的疤痕。這些事情真的讓父親嚇壞了，他的內心深處必然留下陰影。」參本論文附錄。

「台灣文學的開拓者」，並強調負有台灣文學將來能否在中國文壇或世界文壇上佔一席地的「不可推卸的責任」。顯然鍾理和對鍾肇政的觀點是贊同的，對《文友通訊》的存在寄予厚望，並且在第十一次的《文友通訊》中，認為它給台灣這塊土地留下了一粒種子，蘊有無限的可能，只要願意施肥、灌溉和培育，不久就會開出美麗的花朵，擁有豐碩的收穫。他對台灣文學未來的蓬勃發展，做出了大膽預告，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七〇年代因「鄉土文學論戰」而使台灣文學再度起飛，《文友通訊》的努力真的開花結果。

雖然因為《文友通訊》的存在，台籍文友們在那個冷冽的年代裏，可以互相依偎取暖，彼此慰藉勉勵，但這並不代表文友們的文學路從此便平坦開闊，他們邊緣化的地位仍然沒有改變。鍾理和的《笠山農場》雖獲文獎會徵文第二獎，但始終找不到發表出版的機會。陸續創作的作品，因不合當時文壇潮流，投稿、退稿、修改的三部曲不斷上演，「退稿專家」的名號依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當然與當時國府文藝政策的推展有關，「反共文藝」、「戰鬥文藝」是當時文壇的主流，報紙副刊、文藝雜誌等發表園地，無論編輯或作者，又大都為服膺於國府文藝政策的外省作家所把持，整個文壇彷彿銅牆鐵壁，阻絕著毫無反共經驗的台籍作家，作品的發表自是困難重重。然而，相對於其他文友，鍾理和卻是難得具有共產黨經驗的。他在大陸北京期間，正值國共內戰，日記中就披露許多有關共產黨的描述。由於他身處戰時在日本勢力控制下的北京，本身既無政黨立場，戰火又未曾波及，實無憎惡共黨的情感，自然缺乏創作反共文學的動力，更不願為既定的反共政策張目，因此執意執筆時「卻願按自己的意思來寫」（《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廖清秀函》6，頁130）的他，始終還是無法擺脫退稿的厄運。鍾理和在與廖清秀通信的內容中，便提及自己常因動人的稿約而投稿，卻都碰了釘子。

³⁷鍾肇政在日後接受訪談時，也曾回憶道：

³⁷ 鍾理和在寫給廖清秀的信函中曾說：「談到自由中國的刊物和投稿問題，真令人有談虎色變之感。那些刊物是不是有小圈子，像來信所說，我不知道，但說老實話，在從前我確實吃盡了投稿的苦頭。那些年算我天真，看到稿約那誠摯動人的文字，常會不知覺得把稿子投到那裡去，結果很顯然的總是碰釘子的時候居多。」（《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廖清秀函》6，頁112）

是反共文學的年代，有歌功頌德的『歌德派』的，還有懷念鄉土的『懷鄉派』的等等這一類作品橫行無阻的年代，霸佔中國文壇的年代。當然我們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執著，好比反共的，歌德的，我們當然不願意寫。所以命中註定，幾乎就是命中註定，你要成為一個退稿專家，必須熬過這一段歲月。³⁸

台籍作家們絕大部分沒有與共產黨接觸的經驗，他們關心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只希望用樸實的筆來記錄他們周遭所發生的人、事、物。這種不肯向現實低頭，執著於自我的文學信念，處在那個戰鬥第一，反共為先的虛無年代，顯得異常的扞格不入，帶來的自然是不斷退稿的命運。在面對如此無情的挫敗與打擊之後，不可避免地也有憤恨與不滿的情緒。鍾理和在與鍾肇政的通信中，得知李榮春為其新作前來台北尋找出路的艱難情形，不禁有感而發：

我們寫來寫去，到底為了什麼，令人費解。社會拒受我們的東西，如果我們祇是為了寫來彼此傳觀，或者自己玩玩，那又何必？我們豈不是在做天地間最不智的事嗎？（《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鍾肇政函》6，頁29）

而後在健康、經濟同時產生危機時，也在信中向鍾肇政傾訴內心的不滿：

說到創作，更令人氣短。寫出來的東西無人要，要的東西，卻也難得出版，嘔了心血，還算白費。也許不夠堅強，但我常不免這樣想：究竟我們的寫作目的何在？難道我們必須永遠做沒有報酬的工作嗎？當這種灰色的懷疑在噬嚙著心葉時，我有什麼辦法再教自己坐下來寫作呢？（《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鍾肇政函》6，頁38）

作家創作的目的無非希望作品可以問世，接受世人的公評，無論是褒是貶，都成為再創作的原動力，甚至還指望因此賺點稿費，養家餬口。然而，當整個文壇傾全力為政治服務，作家或作品所呈現的意識型態成為審美的唯一標準，堅持原則，嘔心瀝血而成的創作，卻難以得到公平的待遇時，出現這些憤懣、不滿、挫

³⁸ 鍾肇政先生口述。轉引自蔡其昌，《戰後（1945～1959）台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1），頁177。

敗、灰心的情緒自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些負面情緒僅是一時的，鍾理和從來沒有放棄為「台灣文學」奮鬥的宏願，雖然時有灰心沮喪的時候，然「偏偏此心不死，常懷望風嘶鳴之慨」，甚至在通信時，不忘鼓勵其他文友，在文學的道路上互相扶持，彼此打氣。

《文友通訊》的出現，帶給鍾理和的不只是認識諸多文友，在文學的道路上有了可以相知相惜，互相慰藉的同伴而已，最重要的是從此他有了談論文學的對象，自己嘔心瀝血的作品也能尋獲知音。也因為如此，透過他與文友們的書信往返，在彼此談論文學或作品的內容中，我們可以大略瞭解鍾理和對文學所抱持的信念與觀點。

抗戰勝利後，鍾理和曾在〈北平日記〉裏透露了他對文學的基本信念：

記得從前有許許多多文人學者，在他們的作品上、論著上、一切文章上誠惶誠恐狀似「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披肝瀝膽大事其「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字」、「世界新秩序」如此這般的官樣文章。而於今讀之不但無聊，且將令人酸心而發嘔也。

文學之下不可虛假也如此！（《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日記》5，頁32）

文學不能成為政治權勢的附庸，文學的價值在於真實，有真實的感情，才能感動人，否則只能令人發嘔，不值一睹。這樣的信念，基本上貫穿了鍾理和整個文學生命，始終成為他創作上的最高指導原則。回到台灣，所面臨的政治現實是更加的嚴苛，文學環境是更加的惡劣。五〇年代由國民黨政權所一手主導的文藝政策，在「反共抗俄」基本國策的指導下，「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的口號響徹雲霄，大批隨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的外省作家幾乎把持了整個文壇，報紙副刊、文藝雜誌的編輯，民間文學團體的主要成員，幾乎清一色地都是外省作家，政治立場鮮明，意識型態頑固，純文學作品難以有生存空間。鍾理和的〈故鄉〉四部是他自認較為滿意的作品之一，而且在《文友通訊》輪閱時，也普遍獲得文友們的讚揚與肯定，但仍難逃脫投稿後四處碰壁，到處退稿的命運。其實在投稿之前，

鍾理和深知其作品不容於當時文壇潮流的傾向，在與鍾肇政的信函中，便曾自嘲：「像我這樣的作品（指〈故鄉〉），要糟蹋目下報章雜誌的篇幅是不容易的，再待十年看吧。」（《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鍾肇政函》6，頁28）之後，爲了尋求作品的出路，鍾肇政也曾勸鍾理和「為了迎合時代需要，應以發揚民族精神爲首要之務」，認爲「有限度的迎合是可以原諒的」。³⁹對於從不以「高踏」、「清高」自許的鍾理和而言，作品可以發表，甚至換些稿費以維持生活，這是與一般人無異的，因此他也試著力求迎合時勢，例如〈故鄉〉四部所附的「後記」，就是最有力的明證。雖然如此，「真誠」的原則卻始終不願放棄，當他執筆時，「卻願按自己的意思來寫」，「若硬要我拗著心寫東西，姑無論自己願不願意這樣做，也無此才幹」（《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廖清秀函》6，頁130），也因此，他在與文友的通信中，常會流露出對當時文壇狀況的批評：

戰鬥文藝滿天飛，我們趕不上時代，但這豈是我們的過失？何況我們也無須強行「趕上」，文學是假不出來的，我們但求忠於自己，何必計較其他。

（《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鍾肇政函》6，頁46）

我們寫東西所憑依者僅是這一顆熱的心，並不問是不是愛國，倘使寫出來的作品裡面確乎有這麼一點東西，那也不過不得不如此寫罷了，倘竟因此而目他爲什麼什麼主義者豈不叫他哭笑不得？

但是現在的風氣卻在要求你這篇也「愛國」那些也「反攻」，非如此便不足以表示你確係一位愛國者，非如此便不爲他們所歡迎，想起來真是肉麻之極。純文藝云云，純在哪裡？文藝在哪裡？嗚呼！（頁51）

文學創作的目的在於抒發一己之感，根源在於一顆熱誠與真誠的心，看在素來便厭惡各式各樣標語運動的鍾理和眼中⁴⁰，自然令他既肉麻又憤慨。喊得震天價響的口號，只是爲了掩飾它的空虛與懼怕，只是一種「障眼法」，爲的是要欺己欺

³⁹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出版公司，1998），頁132。

⁴⁰ 鍾理和曾在〈北平日記〉中提出如此的批評：「年來一般人只是用幾張紙作各式各樣的標語運動。若問他們運動的結果如何，他們便給你『那不是嗎？都貼著呢！』花去國家和私人多少金錢，而應該有的實在看得起的東西在哪裡？像這樣，教育簡直成了奢侈品了。」（《鍾理和全集·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日記》5，頁43）

人，聊以自慰而已。這樣的風氣，其實也是中國人的通病。魯迅就曾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指出這種「瞞」、「騙」的手法，源自對人生的不敢正視：

中國人向來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藝術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的，深入的，大膽的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魯迅全集·墳》1，頁 241-242）

魯迅呼籲作家應以一顆真誠的心，寫出有血肉的人生，這才是真正的文藝，因為「創作總根於愛」，以愛為基礎的作品，才能感動人心，啟發人生。當他談及文學與革命的關係時，便認為用來宣傳、鼓吹革命的文學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出來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作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魯迅全集·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3，頁 417）這種要求文學真實，流露真情的精神，正是鍾理和文學賴以奉仰終身的信念。此外，魯迅還要求作家真誠的看取人生、正視人生。他不僅對當時社會的弊端提出批判，也常常要求學生應該留心世事，並且強調「創作是有社會性的」（《魯迅全集·而已集·小雜感》3，頁 529）。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他提到了創作小說的動機：

說到「為什麼」做小說吧，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全集·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4，頁 507）

魯迅寫小說，為的是「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是著眼於民族的復興，社會的進步與國民性的提升。在《吶喊》諸篇中，魯迅大膽揭示了中國人集體的病態的國民性，期待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以力圖改善。這種「為人生」的文學態度，是「五四」以來許多作家普遍遵奉的價值，自小受到中國新文學影響的鍾理和，

自然也導向了同樣的創作傾向，再加上從小具有的對社會的使命感，以致他的文學充滿了濃厚的社會意識。他在給廖清秀的信中清楚的表達了文學與社會的密切關係：

一個作家寫他的作品時須不要忘記他寫這東西是要給一般大眾看時，那麼他必須腳踏實地去寫一般大眾都能親近都能看得懂作品。高踏派的作家也許不屑於此吧。他會寫出極其精巧，極其玲瓏，極其優美而祇為某些特限的團體，和專家才看得懂、感到興趣的作品。但惟其如此，他就要永遠失去這廣大的世界了。（《鍾理和全集·鍾理和致廖清秀函》6，頁102）

鍾理和終其一生的文學創作，無論是前期對中國人社會中惡德的批判，抑或後期對故鄉及其周遭人事的描繪，無一不是以芸芸眾生為描寫的對象，以有益於社會人心為最終的理想。例如鍾理和在給鍾肇政的信中，就曾提及當他創作《笠山農場》期間，曾收到一位讀過〈野茫茫〉後的讀者的來信，言其正為同姓結婚之事苦惱，期盼他給予指點出路。他便把原先為悲劇作收的結局更改為喜劇，目的就在於給予目下青年衝破封建桎梏的勇氣與希望。由此可知，鍾理和的創作所在意的不在形式的技巧上，而是文學對社會的實質作用。

《文友通訊》期間，鍾理和孤寂的文學生命蘗露了曙光，彷彿久旱逢甘霖般，不僅密集地重新開始創作，而且還頻繁的與諸文友通信，而在魚雁往返中，一方面互相激勵打氣，一方面也交換彼此對文學的意見。其中要求文學「真誠」與「社會性」二點，與魯迅文學的精神，實有暗合之處。這段期間，鍾理和除了在信中曾把魯迅與契訶夫並列為以短篇小說名世的作家外，他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廿三日的日記中記下「眼見朋輩成新鬼一運喜死！」這裡也可見他慣常以魯迅的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這也說明魯迅的文字在他生命中所展現的魔力。在魯迅文學遭到禁絕命運的五〇年代，無論在鍾理和的日記、書函或創作上，或隱或顯都可以看到魯迅的影響，彷彿魯迅的精神透過鍾理和坎坷的文學生命，曲折地映現在五〇年代反共的台灣文壇上，雖不明顯，但在文學史上仍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

第四節 鍾理和與魯迅的遺書

鍾理和與魯迅二人同是因肺病而死，而在病危或死亡之前，也都曾經留下遺言，仔細交代後事。鍾理和於一九五〇年五月接受胸腔整形手術，在面臨生死攸關之際，於手術前夕記錄下給妻子的遺言：

- 一：吾屍可付火葬，越簡單越好。
- 二：多多想你們自己的事，不必為已死之人傷心。
- 三：鐵兒的病，似在輕微，尚有可為，千萬不可延誤。
- 四：對孩子：首要健康，然後學問；財產不必。
- 五：家庭的苦，我已嚐盡，也因它而有今日，絕不可再使孩子也受此折磨。
- 六：孩子勿使學我，可使種地，地最可靠；卻也不可相強。
- 七：你自己的事，可自作主，勿以我之故，自甘束縛。
- 八：靠別人而能解決的事，祇是些撙下了也不相干的小事，真臨大事，祇有自己可靠。（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日日記，《鍾理和全集》5，頁137-138）

魯迅在肺病日益嚴重的一九三六年五月發表〈死〉，其中文章提及他的遺囑內容如下：

-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 四，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魯迅全集·且介亭雜文末編·死》6，頁605-606）

就以上遺囑的內容來看，其中竟有若干相符之處。例如鍾理和遺囑中的第一點及第二點便與魯迅遺囑中的第二點及第三點，在精神上頗有相通之處，都是希望身

後事可以越簡單越好，不要拖累在世之人。因擁有相同的「反封建」精神，對於傳統「守節」的觀念當然是嗤之以鼻，因此鍾理和遺囑中的第七點與魯迅遺囑中的第四點，都是不希望他們的另一半因為他，而喪失了追求其他幸福的可能。鍾理和遺囑中的第八點與魯迅遺囑中的第六點，都同樣強調遇事只有自己最可靠，要作自己的主人，但表現的方式卻有不同。鍾理和強調相信自我的獨立精神，魯迅卻站在對人的懷疑上立論。鍾理和遺囑第四點與魯迅遺囑中的第七點，都是其個人特殊的人生經歷下的經驗總結，各自有其不同的體悟。鍾理和於一九四六年八月肺疾初發，病倒任所，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八月於病床上修訂〈雨〉時，肺疾復發，咯血而逝，前後整整十四年，無一日不受健康威脅，家庭經濟因而拖累，文學事業因而困躓。所以鍾理和說過：「我寧可要能捐大木頭的笨兒子，也不要沒有健康的小狀元。」健康第一是他對孩子最大的教誨。魯迅「棄醫從文」，一生希望以文藝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不斷地揭發文化或社會上的缺點，「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歸結魯迅一生的文學事業，其精神可以「戰鬥」一詞概括之，舉凡任何阻礙中國進步的人、事、物，都成為他戰鬥的對象。從最早的與《學衡》派、《甲寅》派的論爭；之後與《現代評論》派、新月派的梁實秋、「自由人」、「第三種人」、「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爭辯；到最後「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口號之爭，魯迅對其敵人從來都是無情而嚴厲的，為的就是要徹底地打倒那病入膏肓的惡劣國民性。「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指的就是敵人偽善的面目，這是必須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因為他堅信「『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不過是兇手及其幫閑的策略，所以他也說過『一個都不寬恕！』的話。」⁴¹

此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二人對於堅持一生的文學志業，似乎都不太期待下一代的繼承，不過也都同時留下了伏筆。鍾理和在臨終時有言：「吾死

⁴¹ 汪暉，〈新版導論（代）〈死火〉重溫〉，《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6。

之後，務將所存遺稿付之一炬，吾家後人不得再有從事文學者。」⁴²然這並不代表鍾理和對文學志業的放棄，否則他不會因修訂中篇小說〈雨〉，肺疾復發，咯血而死。他之所以希望小孩種地，是因為農民那種踏實的生命態度，為他所景仰，可以說是他對農民世界的歸屬感的表現。此外，在那個呼喊反共要求愛國的年代，作為一個台籍作家，努力與回饋常常是不成比例的，甚至連累妻兒受苦。因此在文學環境未能改善前，倒不如種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來的踏實。⁴³再者，若為填飽肚皮，儘寫些順應時勢潮流的作品，又絕非他所願為，因而在如此惡劣的創作環境下，自然不願孩子步入後塵。然而「卻也不可相強」的但語，一方面傳達出他對孩子教育所抱持的民主自由的態度，這與他一生「反封建」、「反專制」、「爭自由」的人生態度相符；另一方面也顯現出他對文學的熱情未減，對未來文學環境的改善寄予厚望，而預留轉圜的伏筆。魯迅的心情也是如此。他一生最厭惡的就是一副道貌岸然，骨子裡卻只知趨炎附勢，獲得一己私利的「正人君子」，這些人往往不具備真才實學，滿嘴「公理正義」的胡說謊騙。除非有真才能，可以堅持藝術的理想，否則與其作個徒有虛名，甘為權貴所役使的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倒不如平平凡凡、踏踏實實地尋點小事過活。

以上把兩人的遺書放置一起參照，並不是要說明鍾理和連遺書都模仿或受魯迅影響，而是強調他們在文學事業都經歷苦難，都對文學懷抱堅持與專一，都痛恨封建思想對人的殘害，他們在文學理想上所具有的共同信念之下，在面臨人生即將終結時，對生命意義的嚴肅看待，對親人愛與責任的表現，有著極其相似的觀點，這也側面說明了兩人在文學心靈的契合之處。

⁴²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 85。

⁴³ 鍾理和堅持一生的文學志業帶給他的從不是財富與聲名，而是貧窮與困苦。當一次與其子鐵民的晤談中，獲悉鐵民欲克紹箕裘而以文學為其人生理想時，他語重心長的說：「這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自己決定。你若一定要寫作，答應爸爸一個條件，你不要結婚。你喜歡吃苦是你自己的事，你沒有權利讓妻女也受連累跟你吃苦。」在這段話中，我們看到了鍾理和對妻兒愧疚與文學堅持的矛盾衝突。他反對的不是文學本身，而是當時惡劣的文學環境，只要有覺悟，願意自己負責，文學之路仍是可行的。鍾鐵民，〈父親·我們〉，《台灣文藝》1卷5期（1964.10），頁 17。